

刘勇著

变动不居的经典

明代《大学》改本研究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刘 勇 著

变动不居的经典

明代《大学》改本研究

Copyright ©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变动不居的经典：明代《大学》改本研究 / 刘勇著. —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6.10
ISBN 978 - 7 - 108 - 05705 - 1

I. ①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儒家 ②《大学》—研究
IV. ① B222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111534 号

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
资助（项目编号 Yq2013003）

责任编辑 曾诚 李艳玲
装帧设计 蔡立国
责任校对 安进平 王军丽
责任印制 崔华君
出版发行 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网 址 www.sdxjpc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35 毫米×965 毫米 1/16 印张 23
字 数 285 千字 图 35 幅
印 数 0,001—4,000 册
定 价 48.00 元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目 次

第一章 绪论.....	1
一 转型社会的“共振”	1
二 走出理学的“思想里甲制”	2
三 变动不居的经典文本	4
(一) 理学观念与新经典体系	4
(二) 改头换面的《大学》文本	6
(三) 新观念驯服旧文本.....	9
四 时代变迁与文本去向	10
五 学术史与本书结构	13

上编 文本竞争与思想创新

第二章 《大学》文本变动：新典范开启新竞争	19
一 明代《大学》改本的先驱	19
二 新典范：王阳明与《大学古本》	24
三 新启示：理学学说创新模式	25
四 学倡成为竞争者：湛若水之例	27
五 门人成为挑战者：方献夫之例	40
(一) 理学师徒	40

(二) 拜师有得	42
(三) 论学分歧	45
(四) 师徒关系书写	54
六 《大学》改本：中晚明理学的内在竞争	57
第三章 从古文字到古文本：《大学》文本竞争的新思路	60
一 魏校与《大学》文本角逐风气	60
二 新思路：从古文字到古文本	66
(一) 在玄思冥想中复原古文字	67
(二) 据古文字复原古文本	71
三 “六书载道”与订正群经：新思路的延续及拓展	82
(一) 据印玺复原古文字	82
(二) 从古文字复原到群经订正	91
(三) 石刻古文与多体文本	99
四 竞争催生新思路	106
第四章 《大学》文本竞争的众声喧哗	111
一 几种奇思妙想的竞争手法	111
(一) 海外引进设想	112
(二) 伪造石经本	113
(三) 深山中所藏古刻本	116
二 两种资料汇编反映的竞争情形	119
三 竞争催生自信与自我	125

下编 冲击制度与影响社会

第五章 重新确立官方标准的公开行动	131
一 从捍卫者到取代者：林希元与《大学经传定本》	132
附录一 林希元《改正经传以垂世训疏》	145

二 以“伪本”代替官本：唐伯元与《古石经大学》.....	147
三、管志道的顾虑与退缩	167
四 攻击者想当取代者：张世则与《大学初义》.....	177
附录二 张世则《大学初义疏稿》	188
附录三 高攀龙《崇正学辟异说疏》	191
五 问题化的旧标准与多样化的选择	195
第六章 经筵内外的《大学》文本异同	198
一 恪遵功令的经筵讲官们	199
二 讲官高拱的《大学》讲章	204
三 致仕高拱的《大学》文本质疑	208
四 《四书直解》：变经筵讲章为科举读本	212
(一) 神宗的进讲活动与讲章编刊	213
(二)《四书直解》的文本变动	222
(三) 从经筵讲章到科举读本：文本的拆分与组合	238
五 经筵内外：一元框架与多元实践	254
第七章 文本渗透：教育和科举的世界	256
一 儒学教官的口授笔耕	256
二 泛滥于流行读物：以《焦氏四书讲录》为例	268
(一) 名人效应：晚明出版业中的“焦竑”	268
(二)《焦氏四书讲录》的出版周边	270
(三) 折中与排他：《大学》文本	275
(四)“时文且依他说”	283
三 介入八股范本：以袁黄编纂的举业书为中心	287
四 商业出版改变社会	314
第八章 结语	319
一 经典的变动不居	319
二 新文本冲击旧制度	321

三 新文本与社会结合	323
四 雕版印刷作推手	325
五 玄思冥想作证据	329
六 无所不在的“转型”	334
 参考书目	335
后 记	357

表格目录

表 1 刘斯原·顾宪成两种《大学》汇编所收文本简表	119
表 2 王守仁·朱熹·唐伯元三种《大学》文本异同比较表	163
表 3 王守仁·朱熹·唐伯元三种文本对比示意简表	166
表 4 祁承燝《澹生堂藏书目》著录讲章简表	218
表 5 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讲章简表	219
表 6 王守仁·朱熹·焦竑三种《大学》文本异同比较表	278
表 7 袁黄《四书删正》删正《大学》“三纲领”朱注简表	300

一 转型社会的“共振”

由明太祖朱元璋主导建立起来的“画地为牢”社会秩序，在运行了将近百年后，从15世纪末的明朝中期开始进入剧烈转型时期。在这个转型时代，经济、社会、政治，以及思想、道德等各个领域一变俱变，“共振”式地发生了大体同步的巨大变革。

在社会经济领域，研究者已经深刻揭示出明代中叶发生的结构性改变。特别是在赋役体系里，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，产生了由明初的实物财政，转向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征收货币化、定额化、比例化和单一化的改革趋势，由此开启了“近代意义的赋税制度的出现”。^[1]

在社会秩序方面，同样发生了与赋役制度领域相似的变化趋势。以明初设立的里甲体系和户籍制度为主的基层社会秩序，也在此期间产生了变质、瓦解和重构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与演变中的赋役制度密切互动，进一步加剧了整体性的社会变迁，既改变了基层社会秩

[1] 梁方仲：《一条鞭法》、《明代一条鞭法年表（后记）》，载刘志伟编：《梁方仲文集》，广州：中山大学出版社，2004，页2—3、63—68。刘志伟、陈春声：《梁方仲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8年6期，页65—81。

序，也改变了编户齐民与地方政府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，^[1]甚至改变了明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政治制度。

在行政制度上，意义重大而且情形相当明显的改变同样无可避免地发生了。其中既包括原有制度的职能转变，比如内阁和内府在王朝核心权力结构中取得关键性地位，朝廷六部的职能产生巨大转变；也包括诸如巡抚、总督，以及分巡、分守、兵备道这些重要军政职衔和衙门的全新设立，^[2]乃至各地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相应的新州县设置。

与这些发生在经济、社会和政治制度领域的转变趋势类似，儒学思想领域也大体上同步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要转变。

二 走出理学的“思想里甲制”

如同构建“画地为牢”的社会秩序那样，明太祖朱元璋在教育和铨选领域经过反复试验之后，最终也建立起以科举考试为主导的学校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制度。宋代理学家的著作和思想，在这套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性的正统地位，科举考试“专取四子书及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五经命题试士”。具体而言，“《四书》主朱子《集注》，《易》主程《传》、朱子《本义》，《书》主蔡氏《传》及古注疏，《诗》主朱子《集传》，《春秋》主左氏、公羊、穀梁三《传》及胡安国、张洽《传》，《礼记》主古注疏。永乐间，颁《四书、五经大全》，废注疏不用。其后，《春秋》亦不用张洽《传》，《礼记》止用陈澔《集说》”。^[3]随着宋儒著述在教育和科举

[1] 刘志伟：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：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》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0，页7—11。

[2] 近期的综合研究，参考志远：《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》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08，尤其是第十四、十五章，页285—326。

[3] 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70《选举志二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，页1693—1694。

体系中权威地位的确立，以及永乐年间以宋儒学说为主导的《四书大全》、《五经大全》、《性理大全》颁布天下学宫，明朝前期近百年间，读书人主要以学习和践行宋代理学家的正统学说为主。这种情形，即使是在最负盛誉的理学家身上，也体现得非常明显。

无论是传统观察还是现代学术研究，均已反复指出明初百年间理学家谨守程、朱正统学说的情形。黄宗羲（1610—1695）《明儒学案·姚江学案》“小序”称：“有明学术，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，未尝反身理会，推见至隐，所谓‘此亦一述朱，彼亦一述朱’耳。”^[1]《明史·儒林传序》也强调：“明初诸儒，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，师承有自，矩彟秩然。曹端、胡居仁笃践履，谨绳墨，守儒先之正传，无敢改错。”^[2]这些观察，与明初理学名家薛瑄（1389—1464）所言如出一辙：“自考亭（朱熹）以还，斯道已大明，无烦著作，直须躬行耳。”^[3]现代学术研究也从各个角度论述了这种以“述朱”为特色的主流思想。^[4]如同画地为牢的里甲户籍制下的编户齐民，这个时期理学家们的思想观念，也被安置在由政府指定的程、朱理学既定格局中。

[1]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（修订本）》卷 10，沈芝盈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，页 178。

[2] 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 282，页 7222。

[3] 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 282 《薛瑄传》，页 7229。

[4] 钱穆：《明初朱子学流衍考》，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（七）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5，页 1—33。陈荣捷：《早期明代之程朱学派》，《朱学论集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7，页 215—228。佐野公治：《明代前期的思想动向》，载曹峰主编：《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0，页 48—62。侯外庐等编：《宋明理学史》下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5，页 7—54。山井涌：《经书和糟粕》，辛冠洁等编译：《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，页 405—426。朱鸿林：《丘濬〈朱子学的〉与宋元明初朱子学的相关问题》，《朱鸿林明史研究系列·儒者思想与出处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5，页 177—204。古清美：《明代前半期理学的变化和发展》，《明代理学论文集》，台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0，页 1—42。

就像编户齐民陆续游离既有里甲户籍体系，逐步摸索生活新方式和探寻社会新秩序那样，从明中叶开始，理学家们也尝试着走出理学的“思想里甲制”，在以程、朱学说为主导的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之外，逐渐探索和寻找新的思想方向。《明儒学案·白沙学案》“小序”称“有明之学，至白沙始入精微，……至阳明而后大”，《姚江学案》“小序”称“自姚江指出‘良知人人现在，一反观而自得’，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”。^[1]《明史·儒林传序》更为清晰地描述道：“学术之分，则自陈献章、王守仁始。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，孤行独诣，其传不远。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，别立宗旨，显与朱子背驰，门徒遍天下，流传逾百年，其教大行，其弊滋甚。嘉、隆而后，笃信程、朱，不迁异说者，无复几人矣。”这些带有整体性的观察，都指出明中叶理学思想世界产生了划时代的新动向。^[2]

关于明中叶理学思想新动向的义理内涵和时人论说，已经产生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。本书无须再次复述这些耳熟能详的讨论，而是希望借此强调：与经济和社会转型同步，理学思想观念开始突破程、朱正统的“思想里甲制”，产生了非常明确的新动向；与此相应的重要变化，是制度化的程、朱正统理学经典《四书》，其文本也出现了变动的趋势，特别是其中最受明代理学家重视的《大学》。

三 变动不居的经典文本

(一) 理学观念与新经典体系

跟此前的儒学相比，宋代理学不仅陆续构筑起越来越明确的形

[1] 黄宗羲：《明儒学案（修订本）》卷5、10，页79、178。

[2] 这些观察和立论，主要是就狭义的理学而言的，朱鸿林指出与此并行的另一种新趋势是对经世之学的强调，参 Hung-lam Chu（朱鸿林），“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”，*Ming Studies* 27 (Spring 1989)，pp. 1–33。

而上体系，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政治、社会、道德和日常生活秩序的构想。理学的理念和关怀，集中体现在同样由理学家创造的新经典系统《四书》中。经学史上划时代的“孟子升格运动”^[1]、理学家对于道统论的完善^[2]、孔庙祀典和从祀体系中“四配”格局的形成，以及南宋末年理学家二程、朱熹等进入孔庙从祀行列等一系列变动，^[3]均与这套全新理学理念的胜出和新经典系统《四书》的形成密切相关。

在理学新经典《四书》中，《大学》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。《大学》原本是《礼记》第四十二篇，由于颇能契合宋代理学开创者的理念和关怀，被从《礼记》的诸多篇章中抽离出来。随着两宋理学的不断演进，它历经理学名家的反复改订，最终在朱熹手中形成《大学章句》文本，完整而清晰地表达了理学对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关怀。日后伴随理学走向正统化和制度化，《大学》在儒学经典体系和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中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。

不过，宋代理学宗师们由于在借用《大学》来勾勒政治和社会蓝图时，发现其原有文本并不能与自己的观念和主张完全吻合，因而在借用过程中对它的文本进行了重新调整，并在新文本基础上进行全新解释。不仅如此，随着程、朱理学学说体系的不断演进和完善，改订《大学》文本的活动也在反复进行。两宋最著名的理学宗师们，诸如程颢、程颐、朱熹，每当他们对理学学说体

[1] 周予同：《群经概论》九《孟子》、《中国经学史讲义》下编第四章，俱载《周予同经学史论》，朱维铮编校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0，页190、638—640。徐洪兴：《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5期，页101—116。

[2] 贾德讷（Daniel K. Gardner）：《朱熹与大学：新儒学对儒家经典之反思》，杨惠君译，台北：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，2015，页56—57。

[3] 朱鸿林：《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》，《朱鸿林明史研究系列·孔庙从祀与乡约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5，页1—23。黄进兴：《学术与信仰：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》，《优人圣域：权力、信仰与正当性》，台北：允晨文化出版，1994，页217—311。佐野公治：《四书学史的研究》，张文朝、庄兵译，台北：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，2014，页93—114。

系加以调整、充实或完善时，《大学》文本及其解释往往就会随之变动。朱熹尤其花费了巨大精力在《大学》文本改订和重新解释上，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后，他终于倾力打造出全新的《大学》文本和解释，即《大学章句》一书。日后，包括《大学章句》在内的朱熹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在元朝恢复科举考试时被朝廷指定为标准读本，又在明初获得明太祖朱元璋的重新认可；明成祖永乐年间，再次经由《四书大全》颁布天下学宫，成为读书人必须修读的官定权威文本。

（二）改头换面的《大学》文本

程颢和程颐均曾反复表彰《大学》。如称“乃孔氏遗书，须从此学则不差”；“入德之门，无如《大学》。今之学者，赖有此一篇书存，其他莫如《论》、《孟》”；“修身当学《大学》之序，《大学》，圣人之完书也。其间先后失次者，已正之矣”。^[1]与此同时，对于《大学》文本中被认为“先后失次者”，二程毫不犹豫地动手加以改订。现存《程氏经说》中的《明道先生改正大学》和《伊川先生改正大学》，就是他们各自的《大学》改本。^[2]在此无须缕述二程的文本改动情况，^[3]只需强调一点：由于各自理学观念的差异，就算是二程兄弟之间，对于《大学》文本的看法也已经不能一致了。由此可见理学观念与《大学》文本之间那种如影随形的联动关系。

朱熹在继承和发展二程理学成就的同时，吸收了二程的《大学》

[1] 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卷2上、22上、24，王孝鱼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，页18、277、311。

[2] 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经说》卷5，页1126—1132。

[3] 详参贾德讷：《朱熹之前的〈大学〉》，《朱熹与大学：新儒学对儒家经典之反思》，页23—36。

改订见解，^[1]并再次对《大学》文本进行全面修订。在众多儒学经典中，朱子对《大学》尤其重视有加，前后耗费长达近四十年的漫长时间去钻研，并反复推敲《大学章句》的文本，以求其融贯。他甚至亲自向学生表示：“某于《大学》用工甚多。温公（司马光）作《通鉴》，言：‘臣平生精力，尽在此书。’某于《大学》亦然。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，却不费力。”^[2]直到临终前三日，他还在改订《诚意章》。^[3]最终，朱子将《大学》原文改订为经一章、传十章，认定“经一章，盖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传十章，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”；移易《本末传》，补写《格致传》，并删改个别字词。在其补写的《格致传》中，朱熹提出“即物穷理”观念，作为其理学理论的“最初用力之地”。^[4]对于这些变动，朱熹在《记大学后》一文中做了集中描述：

右《大学》一篇，经二百有五字、传十章，今见于戴氏《礼》书，而简编散脱，传文颇失其次。子程子盖尝正之。熹不自揆，窃因其说，复定此本。盖传之一章释明明德，二章释新民，三章释止于至善（以上并从程本，而增“《诗》云‘瞻彼淇澳’”以下），四章释本末，五章释致知（并今定），六章释诚意

[1] 朱熹主要遵循的是程颐的改本，参李纪祥：《两宋以来〈大学〉改本之研究》，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1988，页68—69、74。贾德讷：《朱熹与大学：新儒学对儒家经典之反思》，页34、46、108—109。

[2] 朱熹著，黎靖德编：《朱子语类》卷14，《朱子全书》第14册，朱杰人等编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，页430。朱子在建议另一学生“看《大学》”时也表示：“我平生精力，尽在此书。先须通此，方可读书。”出处同前。

[3] 束景南：《朱熹年谱长编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1，页1410—1415。

[4] 朱熹：《大学章句》、《大学或问》，《朱子全书》第6册，页20、523—532。对朱子改本的详细描述，见李纪祥：《两宋以来〈大学〉改本之研究》，页59—71；佐野公治：《四书学史的研究》，页142—147。朱子钻研《大学》的历程，参贾德讷：《朱熹的〈大学〉研究》，《朱熹与大学：新儒学对儒家经典之反思》，页37—60。

(从程本)，七章释正心修身，八章释修身齐家，九章释齐家治国，〔十章释治国〕平天下（并从旧本）。序次有伦，义理通贯，似得其真。谨第录如上，其先贤所正衍文误字，皆存其本文而围其上，旁注所改，又与今所疑者，并见于释音云。新安朱熹谨记。^[1]

至此，朱熹借着这部小书，将修己治人的理学理念进行了系统论述，把从个人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八个步骤做了简明阐释，使之成为理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经典依据。其所谓“三纲领、八条目”，最扼要地表达了理学的整体关怀。

更重要的是，经朱子改订的《大学》文本和诠释，最终成为了官方认可的正统学说。《大学章句》在元代被当作科举考试的官方定本，并在明初经由科举制和《四书大全》的重新确认，^[2]获得了制度性保障。上至朝廷经筵日讲，下至乡村举业讲习，此书均是必读的经典之作。并使得读书人和皇帝一起共享一套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系统，^[3]对明代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教育和科举等各个领域产生了至深且广的影响。

[1] 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 81，《朱子全书》第 24 册，页 3829—3830。按：括号中为原注，“十章释治国”乃笔者所加。文中将第九、十两章内容合并而言，未知何故？贾德讷推测可能是朱熹撰毕《记大学后》才将传文分为十章，但并没有再回到此文中将原先的九章分法改为十章（《朱熹与大学：新儒学对儒家经典之反思》，页 109）。但这个推测仍不够圆满，因为《记大学后》开篇就已明确称“传十章”，而后文却只有九章。

[2] 《四书大全》是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放大版本，参侯外庐主编：《宋明理学史》下卷，页 21—30。关于《大全》的成书及其在明代前期的影响，详参朱治：《十四、十五世纪朱子学的流传与演变——以〈四书五经性理大全〉的成书与思想反应为中心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，2012 年 8 月通过答辩，尤其见页 161—180。

[3] 关于朱熹在文本诠释中赋予《大学》“庶民化”倾向，并且分别用此书劝诫皇帝和士人的实例，详参贾德讷：《朱熹与大学：新儒学对儒家经典之反思》，页 37—40、77—78。

(三) 新观念驯服旧文本

在明中叶经济、社会、制度和思想发生剧烈变动之际，受官方权威保护的正统理学学说，以及这些学说赖以寄寓的经典文本，也相应地产生了“共振”式的剧变。其中，承载读书人修己治人理想的《大学》文本变动尤为剧烈。在新观念、新价值、新诉求的驱动下，历经宋代理学宗师反复斟酌损益、明代开国君主钦定的《大学》，其文本被新时代的理学精英们毫不犹豫地加以改订。重新审查经典文本的风气，由此开启。

在这股重订《大学》文本风潮中，由王阳明（1472—1529）公开提出的《大学古本》，即《礼记》原有的《大学》文本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在阳明看来，由朱子改订的《大学章句》不符合圣人本意，“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”；不仅如此，朱子对《大学》的解释也明显错误，“合之以敬而益缀，补之以传而益离”。因此，阳明提倡恢复古本，并以古本为据，重新做注解、写序言，将《大学古本》单独刊刻出版，“去分章而复旧本，傍为之什，以引其义，庶几复见圣人之心”。^[1] 在与对手罗钦顺（1465—1547）的辩论中，阳明甚至借《大学》文本争议，引出其石破天惊的“学贵得之心”的理论：

《大学古本》乃孔门相传旧本耳。朱子疑其有所脱误，而改正补缉之。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，悉从其旧而已矣。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，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。夫学贵得之心。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，而

^[1] 王守仁：《大学古本序》（改序、原序），吴光、钱明、董平、姚延福编校：《王阳明全集（新编本）》卷7，39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0，页258—259、1571。